

#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形势、 路径与国际视野

杨波 张帆 江时学 丁隆 信强 盛文忠 袁勋\*

**摘要：**伴随区域国别学纳入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区域国别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2022年12月《国际观察》编辑部组织召开“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形势、路径与国际视野”讨论会，形成了一组笔谈，分别从外国语言文学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交叉关系、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以及美日俄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建设经验等角度展开论述，为区域国别学构建的立足、立意与区域案例做出初步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认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应探索跨通融导向的学科建设，改善非通用语种师资结构，对标国家需求加强人才培养，改革评价机制实现良性循环；“中国故事”作为知识生产和话语操作场域，介入区域国别话语体系，建构中国知识共同体，助推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中国式沉浸；区域国别学在学科建设层面存在学术积淀、学术理论、学术定位、学者禀赋、学生追求、学术成果、学风、学位点（学位授权点）、学会支撑、学术评价（体系）这十大要素；中国的特色区域国别学需要围绕理论体系、语言训练、田野调查、研究覆盖面等方面开展建设。在国际经验比较方面，专家认为，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实力雄厚，并基于战略、学术和资本的三重驱动，在知识生产创新性、人才培养系统性、学科建设体系化、决策资政机制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为迎合“政治正确”和“金主需求”而急功近利等问题；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悠久且积淀深厚，其研究范式独具特色，这在理论和方法层面给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俄罗斯的区域国别研究即强调学科的自主性，也强调其跨学科研究范式，研究的范畴与方法也在向主学科靠拢。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自主知识体系 交叉学科建设 国际比较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23)01-0127-30

\* 七位专家排名不分先后。

## 外国语言文学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

杨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教授

优秀的区域国别研究者必须全面把握对象国或对象地区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总体情况，长期跟踪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对华交往动态，在对象国或对象地区有较长时间工作或生活的经历，为此就需要掌握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语言，外语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外语学院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尤其是拥有一支掌握国际非通用语言的学者队伍，因而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基地，承担着人才培养和知识供给的重任。

### 一、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新局面与新挑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2013年出版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首次将“国别和区域研究”纳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五大研究方向之中，充分凸显了国家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新布局，提出了依托外语开辟国别和区域研究新局面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对话更加广泛。这些都为外国语言文学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也提出了更高要求。2012年，教育部在全国高校设立首批42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2017年在全国布点建设300多个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截至2022年下半年，教育部下属的各类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总数达到411个，基本实现了覆盖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战略目标。

依托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正在加快进行跨学科布局。区域国别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但是又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紧密关联。国别和区域研究更强调应用性，外语学科联合进行跨学科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的亮点和特色，培育新兴交叉学科，成为推动高校学术发展新的增长点。外语优势也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助推力量。当前，以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为契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正由起步时的单一学科，日益向多学科交叉的跨学科研究发展。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对接区域国别研究需求，积极推进以“跨、通、融”为核心的改革，探索“多语种+”学科布局，率先在全国高校于2014年设立“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点，实行外国语言文学导师与政治学导师的联合指导制度，先后设立英语+国际政治、翻译+工商管理、德语+工商管理、外交学+法语、俄语+工商管理等双

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实现跨学科融合、紧缺与重要结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2018年9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揭牌并自主设置国别与区域研究交叉学科,并于2020年招收首批硕博研究生。

然而,外国语言文学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交叉融合尚处于探索阶段,外语能力、专业理论、田野调查与研究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方兴未艾,尚有很多困境和挑战需要解决和应对。

描述性研究多,系统性研究不足。受学科训练所限,多数外语专业出身的区域国别研究者倾向于搜索和汇编第一手资料,较多从事编译性、资料性、普及性的研究工作,难以对资料来源的全面性和结构的合理性做出判断,研究深度和广度不足,难以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同时,因为缺乏跨学科的研究能力和经历,承担临时性、应急性的委托任务多,系统性研究、深层次分析和前瞻性成果少。多数研究机构和人员主要关注对象国和对象地区的语言文学研究,对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等问题关注较少,缺乏对对象国长期深入、全方位的研究和跟踪,难以做到知己知彼、精准施策。

大国和地区研究多,中小国研究不足。囿于我国外语院校开设语种的限制,以及既有国别区域研究的传统,学界将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美、俄等大国,以及欧洲、北极、东南亚等区域,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于这些热点地区和领域,而对一些小国,甚或周边国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研究的旺盛需求使局面发生了一定改观,但一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国家和地区由于研究范围偏窄,在项目申请、论文发表等环节均处于弱势,已发表的论文、著作的引用率、转载率也不高,中小国家研究资源投入有限、成果鲜有人问津,研究不平衡的现象进一步加剧。

精通外语者多,复合型人才缺乏。由于区域国别问题属于复杂问题,研究人员既要熟悉对象国语言、文化,又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和专业训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区域国别问题要求多视角、全方位动态考察,要求研究者熟知对象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情况。外语学科教师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基于现有学科体系所开展。只精通语言,缺乏整体观、历史观、大局观,即便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也难以挖掘出其中蕴含的历史逻辑和发展态势,无法提出政策建议或建议与现实脱节,难以胜任区域国别研究工作。

## 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新使命与新任务

探索跨通融导向的学科建设。当前,外国语言文学涉足区域国别研究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拓展到政治学、历史学、国家安全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

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外语学者在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地区相关问题的时候，从研究目标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拓展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空间和内容。因此，跨学科、通领域、融合性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多个学科框架下，围绕研究对象进行长时期追踪研究，才能培养出满足国家需求的区域国别专精人才。要大力建设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平台，鼓励现有中文核心期刊开设专栏，策划创办区域国别学专业核心期刊。鼓励外语学科研究者发挥语言优势，在国际期刊，尤其是非英语国际期刊发文，助力提升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国际话语权。

**改善非通用语种师资结构。**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离不开高水平的师资，要切实加强青年教师和学者队伍的建设，注重信息交流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充分调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通过联合培养、合作攻关、引育并举、机制支撑等一系列举措，建设具有全球视野、掌握先进理论、兼具教研能力的非通用语种教师队伍。区域国别研究需加强师资、管理和经费保障。建议启动非通用语种教师提升计划，对现有非通用语种教师进行学历提升、专业培养，改善师资结构。建立双向交流机制，资助教师、学生赴对象国和对象地区访学、交流，吸引对象国和对象地区科研人员来华学习交流，培养知华友华人士。

**对标国家需求加强人才培养。**加大对复合型人才尤其是非通用语种国家人才培养力度，从长远着手构建“本硕博”一体化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体系。要加强理论研讨和实践探索，重点讨论人才培养的方式、课程结构的方案、人才能力的标准，牢牢把握住跨学科、跨专业这一条主线，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上打通学科之间、院校之间、校企之间的横向通道。加大“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通过引进优质国际课程、国外机构联合培养等举措，培养一批既熟悉语言文化、又具备专业素养的复合型区域国别研究专门人才。毕业生的区域国别研究素养、是否适应社会和国家的需要是评价人才培养水平的核心指标。

**改革评价机制实现良性循环。**要切实调动区域国别研究者的积极性，破解成果产出和认定难的问题。尤其是非通用语种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范围窄，且多数成果不宜公开发表，在现行学术、学科评价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各级各类人才项目方面应适当向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倾斜。适当提高区域国别研究在学科评估中的认可度，在国家社科基金、各类省部级规划基金中设立专项类别，优化成果报送、反馈和认定机制。鼓励高校和智库将决策咨询成果应用于专业技术职称和人才项目评审，形成成果认定机制顺畅、研究者学术成长受益的良性循环。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应当发挥学科优势，结合区域国别研究深入推进学科建设，妥善解决需求易变与研究稳定的矛盾、语言多元与信息单一的矛盾、决策思维与科研思维的矛盾、区域视角与全球视角的矛盾，在自身转型发展中更好地回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 “中国故事”作为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方法\*

张帆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

### 一、“中国故事”：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中国式沉浸

就学科发展史而言，区域国别学（Area Studies）是一门不折不扣的西方“大国之学”，历史上长期服膺于帝国殖民统治和冷战地缘政治，是“大国学术”的重要一环，影响全球知识生产。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迅速攀升，中国崛起为名副其实的“大国”，亦亟需一门以国家和区域为单位开展学术研究并形成知识体系的“大国之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扎实理据。显然，虽同为“大国之学”，中国与欧美的区域国别学却肩负着大相径庭的历史使命。因此，中国“区域国别学”的首要任务是扭转欧美研究理路，不再以置身度外的超然态度将关注的国别或区域视为被动客体，研究一个个冷冰冰的“他者问题”，提供一种所谓的“解决方案”，形成一整套“精准”的知识体系，而是以休戚相关的命运共情介入热点区域国别，抉发中国在此讲述什么样的“中国故事”，易于落地生根，被不断征引阐释，丰富并形成中国故事谱系。

在此，“中国故事”不仅是叙事层面的文学、政治、思想、观念的载体，更是认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立场方法。其作为杂糅了多重学科的“学术装置”，我们据此可以考察中国话语曾经、现在和未来对该区域的知识体系发挥何种作用，在何种意义上参与知识生产和推动社会文明进程，这是有温度、有情怀、有生命力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也希望有机会重回世界知识生产的前列，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阻挠，我们也不会退却，也不可能按照霸权国指给中国的路径退出知识生产竞争者的行列，甘心永远做一个世界历史的‘跟跑者’。”<sup>①</sup>这无疑为当下中国区域国别学科指明了努力的目标和愿景。这种知识生产奠基于区域国别经验和“中国故事”基础之上，形成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范式，并重塑区域国别学的界限、意义和价值。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征引阐释及启示研究”（项目批准号：20JZD046）阶段性成果。

① 韩震：《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181页。

## 二、“中国故事”作为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源点”

事实上，以“中国故事”为方法，就是把中国作为政治主体、文化主体和区域主体。“中国故事”生成于中国历史语境，携带中国文化基因，具有中国精神的主体性和创生性。就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谓的历史“长时段”（longue durée）来看，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大国**，是全球知识的策源地和输出国，并藉由“中国故事”传播影响世界。即使是多灾多难的“短时段”（courte durée）晚清近代以降，中国的反帝反殖、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也无不为广大“第三世界”的区域国别学提供独特经验。“中国故事”作为叙事蓝本被广泛征引、阐释改编，兼具经典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故事”作为区域国别对话中重要的知识来源和思想资源，具有知识生产的巨大动能，成为对西方中心主义知识话语体系的反思性力量，参与和影响了国别区域、乃至全球文明的整体进程。当下，“中国故事”作为肩负时代使命的重大命题，是中华文明精髓、中国特色制度、现代化模式、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依据。

“中国故事”作为知识生产和话语操作的场域，介入区域国别话语体系，在知识生产、流通和转化中产生效能，勾连起原本互不关涉的知识社群与区块，在各种思想浪潮、文学运动和社会生活中相互影响、彼此建构，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事件，有机地渗透到现代生活中，具有思想性和现实性双重维度，促进对话和交流互鉴，具有求同存异的统合性和生产力。由此推动中国故事在区域性知识圈流动，与各种思想文化交汇，在有生命力的知识场域里自我形塑，催生出各区域、各国别的集体想象、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等诸多元素，具有结构性变革力量，比如知识结构、情感结构、认知结构等，为区域国别学提供新的思想逻辑，并从区域国别内部产生自反性力量。通过知识考古，建构中国故事谱系，探究中国知识在区域国别内的变异、错位、误读、转换、生产，开拓自我与他者的场域，更加自觉地透视区域国别的文化机理和中国知识的生产机制，包括动力机制、话语机制、传播机制、权力机制等，探索中国故事在区域国别知识体系中释放了什么、催化了什么、驱动了什么、生成了什么，对文化形态和政治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和共建了文明进程。“中国故事”无论是文学文本、政治文本、还是文化文本、思想文本，最终都演化为中国知识共同体，成为变革现实的思想资源和知识动力。

当然,把中国故事方法化,既要抉发中国文化与区域国别文化的可通约性,共享的文化间性,提炼出可供世界共享的核心价值,亦要反思中国之于亚洲研究、欧洲研究、世界研究的有效性及其限度。既要把欧美标准相对化,又要摒弃“中国中心化”。我们旨在重建一种新的观念与理论视野:即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语境中确立中国文化思想,乃至政治体制、治国方略的主体性,在重点区域国别乃至世界范围内构建“中国故事”流散谱系,归纳“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方法论,探索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故事话语机制和知识生产机制,补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而以中国故事的主体性,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出发点,重估中国故事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凸显中国故事对区域国别文化介入性的生成意义,以文化自信自觉抵制主体缺席和知识殖民,进而探索如何干预、参与和组织特定区域国别内的中国知识生产,推动中国故事从边缘走向中心,助力中国知识生产的范式转换。在不断的知识考古和谱系实证研究中,寻找未来可以突围西方范式的可能性,凸显长期被遮蔽、被否定、被消解的中国主体性,走出历史循环与偏见复制。以“中国故事”为方法的区域国别研究,绝非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寻找中国特例和变种,而是在全球化语境和多元文化背景下践行中国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使命。

### 三、“中国故事”数据库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

目前,在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等支持下,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建设的“中国故事”数据库,作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征引阐释及启示研究”的重要成果,以文本为据,史料为证,绘制中国故事的世界版图,展现中国故事立体丰富性和多维流散性。该数据库融通外国文学、语言学、传播学、历史学、区域国别学等学科领域,现涵盖33个语种,涉及4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条“中国故事”数据,引入数字人文技术,全面采集、清洗、序化各语种“中国故事”的流变谱系、动态趋势,精准描摹中国故事在国别区域内的辐射影响。如在亚洲的不同区域国别,其影响力可分为主导型、参与型、辐射型和交互型等,可视化呈现“中国故事”知识转化效能。

重大课题团队依托数据库,基于数据链演变,运用词频统计、词性聚类、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进行多语种文献知识考古,耙梳中国故事历史性流传脉络和共时性交织网格,厘清中国故事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演化,探求中国故事传播路径与流变关系图谱,追根溯源“中国故事”在西方精英阶层的知识生成场域,剖

析西方思想浪潮、文学运动、政治生活中的中国基因。

概言之，以“中国故事”作为区域国别学方法，既是综合实践工程，亦是理论系统工程。首先，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转向：即“中国故事”不仅仅是研究对象，也需要重视它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意义，把它变成我们认识世界与反观中国文化的路径和场域。这是一种研究立场的转向，视野的转向，范式的转换，也是一种开放式的、平等对话的历史思维。其次是修正，从中国故事的角度，修正建立在欧美“特殊的社会文化基础上”、被认为“具有普遍性的价值”，重构区域国别、乃至世界知识体系。最后是超越，以“中国故事”为抓手，在方法论层面反思欧美模式，建构中国知识共同体，助力区域国别研究新方法、新视角、新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 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十大要素

江时学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区域国别研究升格为区域国别学后，当务之急是如何推动构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在国内外学术界，学科建设的含义多种多样，甚至含糊不清。<sup>①</sup>就区域国别学这一交叉学科而言，其学科建设应该包括以下十个要素，我们姑且称之为“十学”。

第一，学术积淀。学术积淀就是学术研究的学术基础，亦即学术前辈为推动学科建设而作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早在1956年，厦门大学就成立了南洋研究所。1961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西亚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由此可见，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有60多年的历史，比美国仅少一二十年。<sup>②</sup>这意味着，虽然区域国别学这一学科是新生的，但其学术积淀极为雄厚，从而为学科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初始条件。

第二，学术理论。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不断地追求理论构建和理论创新。因此，有人认为，判断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否为其创造一种理论。但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也令人误入歧途的。众所周知，作为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是由多个学科构成的，因此，它的理论构建和理论创新应该是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换言之，构成区域国别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已有数不胜数的理论，它完全可以使用现有的各种理论，大可不必（事实上也难以）获得一种能够“统帅”或适用于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当然，否认为区域国别学构建一种“包打天下”的理论，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对这一交叉学科的各种理论进行反思、扬弃、批评或挑战。例如，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的“中心—外围论”难以解释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变迁；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的“倒U型曲线”与拉美和东亚的许多经济体的现实情况未必相符合；当年

<sup>①</sup> “学科建设”的字面意思在英语中可被译为Discipline Construction或Discipline Building，但是国外学术界，这样的表述颇为少见。

<sup>②</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参见Andreas Mehler, Bert Hoffmann, “Area Studies,”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February 4, 2015,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area-studies>, 登录时间：2022年12月1日。

“依附论”倡导的“脱钩”显然是一个“馊主意”；“现代化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还应该指出的是，对区域国别学的现有理论进行反思、扬弃、批评或挑战，既需要内部条件（研究人员的聪明才智），也需要必要的外部条件（学术争鸣以及学术民主）。正如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那样，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

第三，学术定位。学术定位就是如何确定区域国别学的目标。区域国别学的学术定位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对策研究？迄今为止，学术界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作为一种学科，区域国别学应将基础理论研究作为终极目标，因此，从事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学者追求的应该是自己的学术贡献，而非政府的认可。<sup>①</sup>这种轻视应用对策研究的看法有失偏颇。区域国别研究之所以能升格为一级学科，主要是因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需要学术界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因此，未来我们在判断或总结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成就时，关键要看我们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了多少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第四，学者禀赋。学者是学科建设的主体，因此学者的数量及质量对学科建设的影响很大。诚然，我国从事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学者数不胜数，但并非每一个学者都具备以下三个条件：较为高超的汉语表达能力、较高的外语水平、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以及跨学科专业知识。毫无疑问，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并非一蹴而就。在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青年学者需要加倍努力。

第五，学生追求。在区域国别研究升格为区域国别学之前，我国高校已招收了大量与这一学科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中重视区域国别研究能力的提高无疑是必要的。但是，绝大多数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无法与区域国别研究直接“结缘”。这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重点，不是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而是专门面向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博士研究生与博士后。当然，鼓励外语专业的本科生多学一些非外语的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些外语院校已成功地摸索出“外语+”的人才培养之路。

第六，学术成果。学科建设成功与否，与其创造出的研究成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过去的60多年，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已出版了数不胜数的专著，

<sup>①</sup> 转引自安刚：《对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几点思考——访北京大学副教授牛可、云南大学教授卢光盛》，《世界知识》，2018年第12期，第64-67页。

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学术论文。今后，在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应该重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能否进一步重视学术成果的质量，使更多的专著和论文能够成为流芳百世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的学术精品；第二，能否消除中小国家（尤其是小国家）研究、次区域研究的成果发表难这一制度性障碍；<sup>①</sup>第三，能否尽快编写新的为区域国别研究服务的教材。<sup>②</sup>

第七，学风。学风既是学者必须恪守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品行（亦即立德、立功、立言），也是学科建设的道德保障。区域国别研究升格为区域国别学后，应立即为在这一学科中构建良好的学风而采取行动。例如，由于区域国别学涉及众多学科，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方向差异性很大，因此，不同学科的学者必须相互尊重和相互学习，不要相互贬低和相互倾轧；又如，区域国别学注重实地调研，因而所有学者都应该脚踏实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不能急功近利，不能粗制滥造；再如，高质量的学术成果需要理论分析，但理论分析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为了刻意追求学术成果的“理论化”而故弄玄虚。

第八，学位点（学位授权点）。据说区域国别研究升格为区域国别学的动机之一是能设立名正言顺的为区域国别研究服务的学位点。当然，如何设置学位点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有人认为，申报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高校，至少应该拥有十个以上的一级学科。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学科的存在，哪能形成交叉学科？这一观点是否已成为共识？十个以上的一级学科应该包括哪些学科？是否应以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文化为主？作为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涵盖的学科不计其数。但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仅允许区域国别学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鉴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重点是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外交，因此，刻意强调“十个以上的一级学科”，在近期内未必符合现实。

第九，学会支撑。学会是整合各种学术资源、交流不同观点的重要平台。近年来，上外、北外、北语、北大、中大、山大等高校先后筹建了不同形式的区域

---

① 2022年10月29日，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第四届年会发表了《上海倡议》，呼吁学术期刊向与中小国家有关的研究成果倾斜，以扶持中国的中小国家研究群体快速成长。

② 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出版社、山东大学出版社等已编写了几本相关教材。如何编写更为系统全面的区域国别学教材，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大问题。虽然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囊括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但不必为每一个国家写一本教材。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印度等大国可以单独成册，其他国家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

国别研究人才培养或学科建设的机制或平台，为学科建设推波助澜。比如，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的这一平台作用已初见成效，但它仅仅整合了高校的学术资源，今后应吸纳高校外的学术资源，使其成为一个囊括所有从事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全国性学会。<sup>①</sup>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的当务之急是为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出谋划策：如何设立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如何编写区域国别学教材；如何为小国家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便利。

第十，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sup>②</sup>区域国别学的学术评价（体系），除了遵循我国学术界业已达成的共识以外，还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融合发展。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各有所长，各有所用，两者不能偏颇。因此，区域国别学的学术评价（体系）既要鼓励学者出高水平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又要激励学者出高水平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对策成果。第二，如何使区域国别学真正体现交叉学科的交叉性。交叉学科的特点是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相互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因此，一方面，我们要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厚此薄彼或亲疏有别地对待不同的学科，不能对其进行三六九等式的区分；要搞五湖四海，尊重传统，从实际出发，团结奋斗，形成学科建设的合力。

---

① 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是由中山大学于2019年12月发起并成立的，目前已有一百多所高校成为其会员。

② 2017年7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批复成立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其职能是履行“制定标准、组织评价、检查监督、保证质量”的评价职责和科研诚信管理职责，旨在创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研究机构。1997年底，根据当时我国中文信息资源建设的现状和信息服务的需要，南京大学提出了研制开发电子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设想。1999年8月20日，教育部决定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重大项目。

##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建设刍议

丁 隆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区域国别学 (Regional Studies), 又称地区研究 (Area Studies), 或区域国别研究, 简言之, 是指从多个研究角度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人员, 除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领域 (如政治、经济、历史或文化) 有特别的兴趣和深入研究之外, 还必须全面了解该国家或地区的基本情况。这意味着区域国别学是研究者总体上要了解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国情或区情, 并从某一侧面或角度对某一区域或国家进行的专门研究工作。以便在特定领域做出深入的、可能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理论研究。区域国别问题的研究学者, 研究旨趣应集中于1-2个方面, 且应受过所研究领域的专门学术训练。

### 一、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历程

区域国别研究古而有之, 中国等国家自古代大一统中央政权形成之后, 就形成了一套区域国别的研究机制, 产生了大量的杰出著作。然而, 作为学科意义的区域国别研究, 一般认为与生产力的全球扩展有关, 西方学者曾经长期领先。区域国别研究伴随着海外利益的扩张而兴起, 是西理解非西方世界的尝试与努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的船队远涉重洋, 从事贸易和军事征服活动, 现代区域国别研究也率先在上述国家诞生。二战后, 成为全球性国家的美国需要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 促使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兴起。

区域国别学最突出的特征是跨学科、多学科, 这也是国家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其列为“交叉一级学科”的原因。区域国别学若不能与其他学科实现交叉融合, 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只对某个区域或国家的情况做介绍性、描述性的研究, 便失去了学理支撑, 损害其学科独立性。美国学者大卫·桑顿 (D. L. Szanton) 认为, 因为没有任何单一学科可以概括区域的全貌, 而须通过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来认识、分析、诠释异质文化与社会。“跨学科” (interdisciplinary) 或“多学科” (multidisciplinary) 便成为区域国别学的本质特征, 但这也影响了其学科独立性。回顾西方国家区域国别学科发展史, 可以发现其在英国和美国均经历了先盛后衰的过程, 学科建设滞后是其中重要原因。

首先, 区域国别学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区域或国别只是研究对象或范围, 若不能完成学科理论建构, 则缺乏形成支撑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只具有资料性价值, 而无理论意义。在学术实践中, 可发现大量区域国别研究成果未能做出理论贡献, 也未恰当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这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显然不利。

其次，政策研究导向使区域国别学忽视基础研究。咨政建言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传统，即利用公开信息开展政策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类似的研究对政府决策的参考价值不言而喻，却对学科发展贡献并不直接、有力。即使研究机构或学者长期从事某个地区或国家的政策研究，仍无法建立理论化的知识体系，从而不利于系统化的知识生产、积累和传承。

再次，区域国别研究一度被“西方中心主义”主导。西方学界对不同区域和国家的研究服务于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需求，研究话语和研究议程被西方学界主导，不能反映对象国真相，存在明显的“失焦”现象。对异域文化的“猎奇式”探究容易使其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窠臼。如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批评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权力格局对知识生产的桎梏，认为东方主义的背后存在着权力关系，西方用“他者”眼光构建话语体系，弱化、丑化东方。西方主导的区域国别研究居强势地位，遮蔽了非西方国家的有关研究，引导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按照西方学界设定的议题开展。

学科建设薄弱使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高校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许多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多以特定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实证支点或案例，这使区域国别研究仍然在美国国际研究学界中占据重要地位。建国后，新中国开展了大量区域国别研究，有关研究分布在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史等学科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与西方国家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薄弱相似，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需要避免学科独立性缺失，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高度加强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

## 二、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建设路径

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交叉学科，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学科建设中，应遵循该学科的基本规律和特征，借鉴其他国家该学科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路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构建区域国别学理论体系。理论是学科的灵魂，对于一个学科的独立和发展发挥基础性作用。根据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发展的经验，该学科长期不能独立，且经历繁荣后陷入低谷，与该学科只按研究对象地理区域划分，未形成理论体系有直接关系。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科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区域国别研究应当且能够产生自己的理论体系。以中东研究为例，一些学者从中东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具有学科特色的中观、微观理论。如地租国家理论、后地租主义理论；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联盟理论来自对中东政治实践的观察；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阐述人类学理论来自在摩洛哥和印尼的田野工作和文化比较等。这说明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产生地区层面的中观理论，甚至可能产生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宏观理论。

二是重视区域国别人才语言训练。掌握对象国语言是区域国别学的门槛，文献阅读、田野工作、对象国资料与观点搜集和译介、学术交流等研究活动均要求研究者掌握至少1门对象国语言，这已是世界众多高校区域国别学的标配，但在中国尚未成为基本要求。然而，外语对于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外语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条件，并非充要条件，即“不会外语不行，只会外语不够。”外语技能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区域国别研究能力，研究者掌握学科理论、方法论也同等重要。鉴于语言学习的规律，外语训练应在本科或硕士研究生阶段尽早完成。学生外语掌握程度可适当降低，能够满足一般研究和交流需要即可。同时，英语在研究工作和国际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应要求研究者熟练掌握英语。

三是重视国际田野调查工作。田野工作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方法，通过实地调研得到一手的本地知识，是提高研究信度，取得学术创新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区域国别学界尚未在国外大规模开展田野工作，今后应将田野调查作为研究工作的必要环节。同时，应客观看待田野工作，不应夸大田野研究的作用。区域国别研究包括大量书斋、案头的理论或文献研究，这些研究并不需要开展田野调查。因此，不对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厚此薄彼。同时，区域国别学应在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田野工作方法基础上，确立田野工作规范。游客式的访问只能帮助研究者增加对研究对象的感性认识，并不属于科学、规范的田野工作。

四是拓宽研究覆盖面。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对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关注较多，对其研究不仅投入最多、队伍最大，研究也最深入，其中又以美国研究为最。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少得多。对于一些地区和国家，我国政府和公众的关注极其有限，鲜有研究机构和人员从事有关研究。一些对于我国具有重大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地区和国家，我国学界尚未充分重视。如对我国重要的进口石油来源地、工程和劳务承包市场——安哥拉的专门研究就比较欠缺。迄今关于中国与安哥拉经贸关系最全面的研究报告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出版。1990—2009年，我国学者发表的关于索马里的论文仅寥寥数篇，存在知识赤字，缺乏学术传承。索马里海盗危机爆发，严重危及我国利益后，方有一些应急式的研究成果出现。

区域国别研究在古代近代是“帝国之学”，如今已成为“大国之学”。一个国家区域国别研究发展与这个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联。国家崛起带来海外利益的不断扩展，需要更全面而深入地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同时，区域国别研究能够支持国家的国际战略构建和海外利益扩展。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短短的70余年里，走完了西方国家两个世纪走完的路，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中国融入全球化洪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世界性大国的伟大进程，要求中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意义，加强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 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信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就全球各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能力和水准而言，美国的综合实力可谓独占鳌头，遥遥领先于世界诸国。历经多年的发展，美国国内目前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人员众多，机构也十分庞杂，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首先是美国大学体系中从事相关研究的学术科研机构。例如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等美国顶尖高校内，不仅设有专职从事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研究的院系，而且拥有大量从事区域和国别专题研究的研究所或中心。这些隶属于大学的研究机构和人员不仅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主力军”，所涉及的研究议题更是包罗万象，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几乎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为相关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坚实、雄厚的学理基础。

其次是为数众多的社会智库。作为区域国别研究“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拥有大量历史悠久、国际知名的专业智库，包括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这些著名智库往往长期致力于一个或多个区域、国家的研究，拥有专业的研究团队以及充沛的资金来源，与政界、商界、学界和传媒界互动密切，因而拥有较高的公信力和能见度，也具有相当强的学术影响、决策引导和舆论辐射能力。

第三类则是政府部门直接拨款设置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例如专责为国会参众两院立法服务的国会研究局，隶属于五角大楼的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美国军事学院（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sup>①</sup>海军学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海军战争学院（United States Naval War College）、空军学院（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等等，以及行政部门某些部委所设立的独立或半独立的类似机构。这一类型的研究机构虽然数量相对较

<sup>①</sup> 美国军事学院也常被称为西点军校（West Point）。



少,所涉及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也较为聚焦(如地理学、情报学、区域和国别军事战略和科技等),但是由于其属于“体制内”机构,有着接触和获取敏感信息甚至机密情报的特殊渠道,也因此可以承接大量涉密的决策咨询任务,其得出的研究成果也会得到各方普遍认可,并对立法和决策产生直接且重要的影响力。

审视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其建立和拓展主要源自以下三种动力的驱动。首先是“战略驱动”,亦即基于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决策的需要而开展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区域国别研究主要集中于欧洲和拉美研究,对世界其他区域和国家的关注并不多。但是随着美国在二战后成为跃居国际舞台中心位置的超级大国,并开始与苏联在全球展开霸权争夺,由此为区域国别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例如在冷战期间,为了击败苏联这一头号对手,美国国内的苏联研究机构可谓遍地开花,产生的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上述许多机构旋即陷入生存危机,甚至就此消弭,大量苏联问题专家也被迫转行。与之相反,二战前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甚少,中国研究力量也相当单薄。例如即便是久负盛名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其研究领域也主要聚焦于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化,而对于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研究则十分稀缺。冷战期间,美国的中国研究逐渐得到了增强和拓展。而近年来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国内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组织和项目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员随之激增,研究的范围也急速扩大,几乎涵盖了与中国相关的所有领域和议题。

其次是“学术驱动”。尽管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很强的咨政功能取向,但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为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提供创造性的知识生产无疑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目的。事实上,美国许多区域和国别研究均是由大学相关院系首开先河,从特定区域和国家的历史、哲学、语言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入手,遵循学科建设的固有规律和要求,以及学术研究的自身逻辑和需要,并基于研究人员的个人研究兴趣与学术专长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例如美国的越南研究最初便主要集中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越南语和越南社会研究。此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推动下,哈佛大学于1960年左右开始通过设立专项奖学金、聘请越南籍学者加盟、收集越南古籍资料、讲授越南历史政治课程等方式,使得哈佛成为美国越南研究的学术重镇。而美国政府和社会则是直至美国被逐步卷入越战泥潭而不可自拔之际,才开始为了尽快结束越战梦魇而对越南问题研究予以广泛关注。

最后是“资本驱动”。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其对外安全、军事、经济、金融、贸易政策往往不仅能够对特定区域和国家造成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冲击,也会对很多在全球进行布局运营的跨国公司巨头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鉴于此,为数众多的国家政府、美国本国或是他国的跨国公司、特

定利益集团、企业家会通过各种方式，包括通过主权基金、私人基金会、企业或个人捐款的形式，为美国国内大学、智库等机构提供资金，以推动开展相应的区域国别研究。例如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等中东国家每年都会为美国的中东研究机构慷慨解囊；又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日本笹川和平财团（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以及韩国SK集团（SK Holdings）等组织和企业也会为诸多亚洲研究机构提供巨额资助。

时至今日，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基于战略需要、制度特性以及自身国情，在知识生产的创新性、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学科建设的体系化、决策资政的机制化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首先，研究范围广泛，研究能力强大。作为利益遍及全球的超级大国，美国需要对全球进行几乎“全方位、无死角”的关注，以此来保证其全球霸权的延续。正因为此，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视野覆盖了全球所有重要区域和主要国家。就区域而言，无论是传统的欧洲（西欧、北欧、中东欧、南欧等）、拉美、中东、东北亚地区，抑或是非洲、中亚、东南亚、南亚、加勒比、南太平洋地区，均有为数众多的研究机构在进行持续跟踪和深入研究。而就国别而言，美国的研究对象不仅涵盖中、俄、日、印等大国，而且囊括了一众中等地区强国（如韩国、越南、印尼、巴基斯坦、埃及、伊朗、哈萨克斯坦等）以及诸多重要的小国（如新加坡、阿联酋、蒙古等），就其总体研究能力、水准、深度和广度而言，均居于全球各国的首位。

其次，研究基础雄厚，专业队伍庞大，研究科学性、规范性强。例如美国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历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薪火相传，积累了海量的图书、资料、文献、档案和数据，形成了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团队，从而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源源不断地培养大批高素质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人才。又如鉴于区域国别研究“天生”就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学科领域，不仅关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而且往往还会涉及到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为此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十分重视多学科、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例如美国很多专注于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的研究机构，便延揽了许多拥有核物理、导弹技术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而在中东问题研究领域，不仅有传统的地缘战略、地区安全、宗教学、人类学分析人士，也有许多精通能源科技甚至气候变化问题的专家。此外，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注重基于“历史—政治”分析的定性研究，强调实地调研和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也十分强调数据分析、统计方法、数学建模、计算机模拟等定量方法的运用，使得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较强的学理基础，也更能产出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成果。

第三，得益于“政府—大学—智库”之间的“旋转门”机制，美国区域国别研究能够将学术研究和决策实务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性决定了其不会也不能局限于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基础性的、经典“象牙塔式”的

学术研究,而是无可避免地与现实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实务紧密相联。在“旋转门”机制之下,美国很多驻外使节、中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将领能够在离任或退役后转至大学、智库任教或者从事研究。由于这些人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广泛的国内和国际人脉,熟悉政府决策程序和内幕,因此能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资料、信息和素材。与此同时,很多在大学、智库工作的学者和专家也有大量的机会进入政府任职,利用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为决策服务,甚至成为美国对某一区域和国家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在美国政坛,“今日教授、明日高官”的现象可谓屡见不鲜,其中不乏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重量级“政学两栖”人物,从而形成了一种运转顺畅甚至“无缝连接”的双向交流渠道,这也成为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和突出特点。

虽然美国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拥有首屈一指的综合实力,并具有许多独特的固有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弊端,包括为了迎合“政治正确”,或是为了取悦“幕后金主”而急功近利,曲意逢迎,罔顾客观中立原则的问题也可谓层出不穷。由于区域国别研究与决策圈关系密切,加之“旋转门”机制的存在,使得很多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强的功利性,甚至严重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以当前逐渐成为“显学”的中国研究为例,近年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如过江之鲫,然而其中很多人对中国国情只有一些浮光掠影的认知,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缺乏基本的了解,甚至有些人从未踏足过中国,但这却丝毫不会妨碍他们为了迎合对华强硬的“政治正确”,基于其主观臆断对中国横加指责,甚至为了谋求一官半职而哗众取宠地提出各种奇谈怪论。此外,对于许多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机构和人员而言,寻求外部资助以获取持续、充裕的研究资金始终是其首要任务。虽然相关机构和学者都会异口同声地宣称其会进行“客观”“独立”的研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会刻意迎合幕后金主的意识形态取向和政策偏好,从而导致很多区域国别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大打折扣。

尽管中美两国国情、民情、社情有别,但是强大的区域国别研究可谓是一个世界性大国的标配。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以及国家利益边界在全球范围的拓展,中国也亟需加强自身区域国别研究的能力。作为该领域研究的领头羊,美国的很多经验无疑值得我们予以学习和借鉴,包括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学科建设的科学性、“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紧密联动和相互促进等。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全力防止和避免美国的弊端和缺陷,从而令中国方兴未艾的区域国别研究能够迅速发展壮大,为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做出应有的学术和资政贡献。

## 日本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盛文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

区域国别研究在日本被称为地区研究（日语为“地域研究”）。日本的地区研究历史较长且经验丰富，其研究范式和内容也独具特色，研究成果数量众多，研究水准受到了日本国内和国际同行的认可，尤其对中国、俄罗斯、美国及东南亚、朝鲜半岛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地区研究的大国。日本的地区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起步早，历时悠久，积淀深厚。日本的地区研究发端于自古以来“汉学”，至少可上溯至江户时期（1603—1868年）和明治时期（1868—1912年）。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汉学”传统，江户时期“汉学”趋于成熟，与日本本土学术“国学”、荷兰学术“兰学”鼎足而三，为一大显学，德川幕府还把汉学中的朱子学尊为官方哲学。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文化现代转型的推进，汉学逐渐失去了官学地位，但仍然是一个未被忽略的学术门类。现代意义上的地区研究可上溯至明治维新至二战时期，这段时期日本的地区研究主要是为其殖民扩张和占领服务的。明治维新之后采取的扩张政策和殖民活动主要在东亚，所以日本的亚洲研究（日本称东洋研究）起步较早。

日本的地区研究从战后开始逐渐制度化。战后初期，日本面临美国占领、美日结成同盟以及美苏冷战格局等全新的国内外环境。此外，日本地区研究的主要对象——东亚地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半岛的分裂、东南亚国家相继独立等。日本战败导致战前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的地区研究机构纷纷解体，日本的地区研究出现短暂空白。战后美国在日本对外政策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基金会对日本地区研究项目的支持，以及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日本地区研究人才的回归，使日本新建立的地区研究体制深受美国地区研究的影响。在研究内容方面，由于以前主要研究对象的变化，日本既有的地区研究体制也得到相应的调整。<sup>①</sup>战后日本的地区研究在吸收借鉴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地区研究的概念、理论、方法以及开展地区研究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又保持自身地区研究的传统，在充分占有资料和获取信息的基础上追求本国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独创性，将地区研究的各个环节做实做细，逐渐发展成一个具有自身特色

<sup>①</sup> 于铁军：《日本特色的地区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第43页。

的地区研究大国。

第二，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数量众多。日本的地区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虽然没有专门的数量统计，但从部分研究机构的人数便可见一斑。战前的满铁调查部（満鉄調査部），巅峰时期雇佣人员超过2000人；战前的东亚研究所（東亜研究所），最多时研究人员数量超过1000人。战后成立的东方学会（東方学会）现有会员超过1500人。1953年成立的亚洲政经学会（アジア政経学会）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区域学会组织，会员超过1000人。美国学会（アメリカ学会）会员人数约为1300人。由于日本的地区研究起步较早，尤其在亚洲研究领域有着较为深厚的积累，由此造就了不少地区研究专家。战前如中国研究者内藤湖南（Naito Konan）、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中山优（Nakayama Masaru），美国研究者高木八尺（Takagi Yasaka）、松本重治（Matsumoto Shigeharu），印度和伊斯兰教研究者大川周明（Okawa Shumei），东南亚研究者板垣与一（Itagaki Yoichi）等，战后如中国研究者毛里和子（Mori Kazuko）、天儿慧（Amako Satoshi）、国分良成（Kokubun Ryosei）、高原明生（Takahara Akio），东南亚研究者白石隆（Shiraishi Takashi）、山影进（Yamakage Susumu），俄苏研究者木村汎（Kimura Hiroshi）、下斗米伸夫（Shimotomai Nobuo）、松里公孝（Matsuzato Kimitaka）、岩下明裕（Iwashita Akihiro）、袴田茂树（Hakamada Shigeki）等。

日本的地区研究机构数量众多，战前和战争期间从事中国和亚洲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包括：其一，位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東亜同文書院）（1900—1945年），负责培养从事对华工作人才、搜集情报和研究出版各种内部专题调研报告；其二，总部位于大连的满铁调查部（満鉄調査部）（1907—1945年），是日本的国策智库，主要从事包括中国东北（伪满洲）和朝鲜的历史地理、华北资源等方面的调查活动；其三，东亚研究所（東亜研究所）（1938—1946年），是日本企划院下设的国策研究机构，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综合视点出发，对中国东北（伪满洲）、南洋、蒙古、苏联远东地区、印度（含缅甸）、中近东、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附属岛屿进行综合性的地区研究；其四，东京帝国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東京帝国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41年至今），以对东洋文化展开综合研究为宗旨，内容涵盖文史哲、政法和经济商业三大领域。<sup>①</sup>战前日本的地区研究尤其是东亚研究，在组织机构、研究人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政策影响等方面，均已具备相当规模，研究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日本地区研究的主要特点均已基本定型。

<sup>①</sup> 于铁军：《日本特色的地区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第42页。

战后日本地区研究机构大致可分为由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由法人代表、学会、协会形式运行的民间团体组织以及在大学里设立的研究机构三种类型。由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主要有：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防衛省防衛研究所）、<sup>①</sup>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アジア経済研究所）、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財務省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国立研究開発法人科学技術振興機構中国総合研究交流センター）；由法人代表、学会、协会形式运行的民间团体组织主要有：东洋文库（東洋文庫）、<sup>②</sup>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所）、东方学术协会（東方學術協会）、<sup>③</sup>日本中国学会（日本中国学会）、日本现代中国学会（日本現代中国学会）、亚洲政经学会（アジア政経学会）、<sup>④</sup>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在大学里设立的研究机构主要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sup>⑤</sup>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京都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美国学会（アメリカ学会）。<sup>⑥</sup>这些新成立的地区研究机构，很多都有美国支持的背景。由日本政府出资成立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下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则是战前和战后日本地区研究密切联系的结果。其宗旨是加强对战后亚洲的研究，密切日本与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现已发展成日本乃至世界最大的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为重点的地区研究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组织和研究模式深受“智库元祖”满铁调查部的影响。

第三，地区研究在日本国内学术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地区研究在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学术体制中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一直是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主要研究领域。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学科体制方面建

① 防卫研究所成立于1952年，日本最高军事科学研究机构，也是自卫队高级干部的教育机构和日本最大的战争史研究中心。

② 东洋文库成立于1924年，是亚洲最大的东洋学中心、全球第五大亚洲研究图书馆、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1948年成为日本国会图书馆主要分支机构。

③ 东方学术协会成立于1947年，1948年更名为东方学会（東方学会）。

④ 亚洲政经学会成立于1953年，是日本会员最多的从事地区研究的学术组织。

⑤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成立于1955年，2014年更名为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スラブ・ユーラシア研究センター）。

⑥ 详见刘立群、李吉子：《日本主要中国学研究机构介评》，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8年第10期，第38-41页。

立了比较稳固的基础。相关课程在大学里颇受学生欢迎。有许多专门从事地区研究的半官方研究机构,如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等。在日本学术会议中,地区研究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并且是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的主要资助领域。日本各主要大学普遍设有地区研究的教学和研究部门,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日本的地区研究不仅没有被定位于学科之下,而且在理解现代社会方面发挥着部分基础性的作用。<sup>①</sup>但在日本经济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加剧、政府削减大学拨款的背景下,日本的地区研究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第四,研究方法独具特色。战后日本的地区研究深受美国的影响,但在学习和借鉴美国地区研究的成果时,并非全盘接收,而是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其一,重视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对日本的地区研究者来说,实地到访研究对象所在地,几乎是一个铁律。二战前及二战期间,日本为巩固其在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对这些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自然状况、资源禀赋、风土人情、经济作物、政治社会结构、契约制度等方面的详细调查,后又在中国东北(伪满地区)、华北和东南亚占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使用的方法类似当前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调查方法,将详细具体的调查成果系统整理成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撰各种内部报告和公开出版物。战后日本的地区研究者也一直秉承着这种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

其二,重视对英语和当地语言、文化的学习。日本的地区研究非常重视对英语和当地语言、文化的学习,并以此作为地区研究的基本门槛。为帮助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掌握当地语言和了解当地情况,日本外务省很早便设立了特别调查员制度,邀请专家学者到其研究的国家和地区进行驻馆研究。

其三,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地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验和实证研究,需要长期的可靠、系统、可持续的资料支撑。日本主要的地区研究机构普遍都配备有高水平的附属图书馆或资料中心,而且尽量提供方便的检索和查阅。例如爱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珍贵文献《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旅行报告书》。

其四,重视传统的历史实证方法,重视运用综合方法进行细致入微的全方位观察和分析。推崇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进行详尽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无法适应研究课题的综

<sup>①</sup> 于铁军:《日本特色的地区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第37-38页。

合化趋势，因此学科联合以及研究机构之间的联合便成为必然的结果。日本的地区研究乃至国际关系研究很少使用复杂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

其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及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寻求理论创新和构筑自身的理论特色，较少抽象地讨论理论。<sup>①</sup>

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需要精耕细作和常抓不懈的领域，优秀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需要长期的培养和训练。日本的地区研究处于一种较为良性的发展状态，其研究路径和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者学习和借鉴，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可以开阔我国学者的学术研究视野。批判性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外的理论、概念，并结合区域国别研究的具体实践，探索反映中国经验、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是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者需要面对的首要课题。简单挪用国外的理论和概念无法有效解释各个区域正在发生的变化。探究区域国别研究的动态性结构，不仅对于在理论上理解该区域各种现象极为重要，通过考察该区域难以改变的特质本身，还可以预测该区域的中长期的变化趋势，这是进行中长期前景展望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

其次，日本的地区研究成果可以为解决我国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提供参考。无论是宏观还是中观的研究范式都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微观实证研究来加以验证，因此不仅需要不断积累对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的微观定点观测调查，也需要加强与国外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和机构交流互动来进行补充和完善，同时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比较，致力于建构新的研究范式。

最后，日本的地区研究成果可以为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者收集文献资料和考证提供有益的帮助。日本的地区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实际调查和文献资料收集和考证的基础上，有着非常深厚的积累，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成果及时获取信息，为研究奠定文献基础。

当今世界格局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改变，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需要关注国外的相关研究。日本是我国的近邻，两国存在着广泛多元联系，掌握日本的地区研究动态和成果，及时为我国政府和企业提供精准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在当下具有不言而喻的战略意义。

<sup>①</sup> 于铁军：《日本特色的地区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第45-47页。



## 俄罗斯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建设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袁 勋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俄罗斯学界区域国别研究由来已久,知识体系及学科名称也不断变迁。12—17世纪的俄国朝圣者和商旅就以“纪行”(хождение)的文学形式对异域风土进行过细致入微的记述。19世纪,地理国情学和人文国情学在俄罗斯兴起,一大批关于俄罗斯帝国亚洲部分及毗邻区域的研究成果问世,内容涵盖相关区域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地理学出现了向人文学科回归的倾向,其中,经济地理学领域逐渐形成新的研究方向——“综合国情研究”,<sup>①</sup>俄罗斯著名经济地理学家Н.巴兰斯基(Н. Баранский)对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化阐述,并在俄罗斯建立了“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的学科分支。<sup>②</sup>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区划理论”(районирование)逐渐完善,该理论提出了研究区域划分与治理的系统性方法,成为日后俄罗斯“区域学”(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研究的基础方法之一。80年代末,区域研究开始承担解读“社会历史进程研究”的使命。<sup>③</sup>每个专业领域的学者都试图从本学科框架内对区域学进行诠释和建构。直到今日,关于区域学(区域研究)的学科定位仍在讨论之中。按照区域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当今俄罗斯学界对“区域研究”学科定位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 一、归属大学科之下建设,将研究范畴与方法向主学科靠拢

目前,俄罗斯“区域研究”主要在以下学科范畴内开展:其一,地理学范畴内的“区域研究”。俄罗斯《区域研究》教材的作者Ю.格拉德基(Ю. Гладкий)和А.奇斯托巴耶夫(А. Чистобаев)认为:“将区域研究称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是轻率的,它是地理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区域地理学的一个非常重要和特定的部分”,“纯粹的地理分支学科”。<sup>④</sup>同样的,В.拉祖莫夫斯基(В.

<sup>①</sup> [俄]叶·瓦·科尔东诺娃,克·亚·叶芙列莫娃,王嘎译:《世界综合区域学研究的俄罗斯学派及其传统》,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2期,第143页。

<sup>②</sup> Баранский Н.,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М.: 1-я Образцовая тип., 1928, С. 455.

<sup>③</sup> Роккан С., Урвин Д., ‘*Политика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европейскому регионализму*, 2003, № 6 (40), С. 117–118.

<sup>④</sup> Гладкий Ю. Н., Чистобаев А.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М.: Гардарики, 2002, С.43.

Разумовский)、Д.塞瓦齐亚诺夫(Д. Севастьянов)等学者也将区域研究视作地理学的分支,认为“区域研究”的任务是形成“对世界大片地区的综合概念”,“获取关于特定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联系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前景的一般信息”。<sup>①</sup>俄罗斯著名地理学家Н.巴兰斯基(Н. Баланский)甚至将“区域研究”比作“地理科学的穹顶”,他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是基于对构成地理学本质的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没有区域国别研究的地理学是毫无意义的”。<sup>②</sup>地理学家С.拉夫罗夫(С. Лавров)和Г.斯达修克(Г. Сдасюк)认为“区域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具体的不同类型国家的自然与社会互动模式”,“区域国别研究不仅应该涵盖了有关该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知识的综合,而且还包括对相关国家领土和区域地缘政治问题的创造性分析”。<sup>③</sup>根据上述学者的观点,“区域研究”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其研究内容体现了地理学科的本质。

其二,政治学范畴内的“区域研究”。В.盖尔曼(В. Гельман)和С.雷热恩科夫(С. Рыженков)等学者将“区域研究”理解为“对区域和地方层面的宏观政治制度发展、区域一体化和地方治理等问题研究的综合”,认为其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Росси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教授Н.梅德韦杰夫(Н. Медведев)等学者认为,“区域研究是政治学的方向之一,主要研究国家和社会的区域结构,区域发展和区域间相互作用的问题,同时特别注重对政治现象的空间形式、区域精英形成过程的及其特殊性、区域政治环境对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sup>④</sup>俄罗斯政治学领域的“区域研究”主要分为国外区域研究和国内区域研究两个大方向。国外区域研究将“区域”视作国际(全球)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层面”,侧重研究区域一体化进程、区域地缘政治等问题;而国内区域研究则重点关注俄罗斯地方政治运作、精英状况、央地关系、地方选举等问题。目前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政治学与区域学”作为一级学科存在,足以见得俄罗斯“区域学”知识领域与政治学的密切关系。

其三,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区域研究”。近年来“区域研

① Разумовский В. Н., Севастьянов Д. В.,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структур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7. Геология. География. 2009. № 4, С.81.

②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Науч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географии, М.: 1981, С.114.

③ Лавров С. Б., Сдасюк Г. В., ‘Глоб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опросы географии, М.:1981, С.116.

④ Медведев Н.Н., Дмитриев С.В., Старостенков М.Д., Захаров П.В.,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колебаний локализованной моды в двумерном упорядоченном сплаве стехиометрии АЗВ,’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2009,Специ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7), С. 213 - 217.

究”成为语言学、文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俄罗斯语言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区域研究”更加重视对境内不同区域族群“俄罗斯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这与俄罗斯广袤的领土、复杂的历史轨迹和多元的民族构成密不可分，使得相关领域的“区域研究”也具有了更加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

## 二、定位于多学科交叉领域，强调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

莫斯科大学（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И.巴甫洛夫斯基（И. Павловский）教授强调“社会文化区域学”（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的重要性，主张区域研究应重点关注“区域中优先的或起主导作用的非变量因素”，以及文化的“地方性”（дырчатость）。<sup>①</sup>他认为，这些因素会造成该区域内外文化和思维的差异。此外，巴甫洛夫斯基重点关注迁徙民族与特定区域的互动关系，并提出了社会文化“区域研究”的三个重要任务：第一，为特定区域内的迁徙民族问题研究创造统一、具体的术语体系，防止笼统的术语描述违背该区域的历史事实；第二，研究特定区域对迁徙民族语言、文化、社会风貌的影响，揭示区域对民族特性的影响机制；第三，重点关注出生地赋予迁徙民族不随时间、地点改变的“文化基因”。从以上表述可知，巴甫洛夫斯基将“区域研究”视为民族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哲学交叉领域的一个知识分支。<sup>②</sup>

《区域研究》教材的主编И.巴雷金（И. Барыгин）教授指出：“如果我们对不同学科方法与区域研究的密切程度进行排序，就会发现，相对于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区域研究更接近于社会学和政治学”。<sup>③</sup>由此可见，这一类学者对区域研究的主要观点是承认其跨学科属性，但对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阐述都是基于某一原有学科的拓展，并不认为区域研究与其他学科存在明显的学科边界，本质上仍属于某一学科的从属研究方向。目前，这一派别观点在俄罗斯学界中占据主流，并对俄罗斯区域研究的学科构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① 术语“文化孔洞”（дырчатость культуры）在巴甫洛夫斯基的作品中可以理解为一个地区文化生活中完全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他认为，研究一个地区的文化不仅要研究该地区民族文化中存在的现象，还应当研究该地区缺失的文化现象，并同时在其它地区进行观察对比。

② Павловский И. В.,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сегодня,”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19: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меж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2005, № 2, С. 145–156.

③ Барыгин И. Н., “Те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в контексте основных научных парадиг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спертиза: ПОЛИТЭКС.*, 2005, Т. 1, № 3, С. 114–123.

### 三、将区域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加以建设，突出学科的自主性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МИД России）A. 沃斯克列先斯基（A.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教授将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与国情学结合起来，创立了“世界综合区域研究”（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学科。他认为：“世界综合区域研究是一门体系健全的、独立的学科，有着具体的研究方法、学科论域和理论工具。主要研究世界各地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形成与运作模式，同时考察该地区发展中历史、人口、国家、宗教、文化、人类学、环境、政治、法律、自然资源、国际政治和国际分工等因素的地位和作用”。<sup>①</sup>E.戈杜诺娃（E. Колдунова）认为，世界综合区域研究的目标是“在全球层面研究本国及所在区域发展的特殊性，解释全球、区域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sup>②</sup>在概括俄罗斯区域学研究现状时，A.沃斯克列先斯基特别指出，“在这个跨学科与整体化的方向上，空间的、时间的和结构的方法融为一体，旨在全方位地理解世界共同体综合性的、在地理上又相互区隔的区域特征。唯有把握这一特征，才能够在结合全球与区域规律及内部与外部规律基础上，找到一条最适宜的发展之路”。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区域研究学科体系构建的逐步完善，强调该学科独立性的学者数量不断增加，但是，这些学者的观点往往存在矛盾，在区域研究学科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也存在学科边界不明晰，学科论域和研究方法不明确等问题。就目前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和教育计划实施的实践来看，“区域研究”更像是“多学科”的具体研究方向，而不是具有“跨学科”特点的独立理论系统。

（作者简介：杨波，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教授，博士，上海，200083；张帆，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上海，200083；江时学，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博士，上海，200444；丁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上海，200083；信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上海，200433；盛文忠，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博士，上海，200083；袁勋，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时间：2022年12月

（责任编辑：齐沛禾）

<sup>①</sup> Под ред.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М.: Магистр, 2014, С. 24.

<sup>②</sup> Колдунова Е.В.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как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подход и учеб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6, № 50 (5), С. 63–69.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Area Studies in China: its Situation, Paths and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Yang Bo Zhang Fan Jiang Shixue  
Ding Long Xin Qiang Sheng Wenzhong Yuan Xun

**Abstract:** After Area Studies became an independent first-level discipline under the interdisciplinary category, the long history of no clear disciplinary attribution of Area Studies ended. In December 2022,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view organized a seminar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Area Studies in China” and formed a group of written exchang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lations amo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nd Area Studies; the methods of Area Studies;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n Area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Russia, to make a preliminar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foothold, purpose, and regional cas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rea Studies. The disciplin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ould explore inter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in Area Studies,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teachers in non-common languages, strengthening talent training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reforming the evaluation institutions to achieve positive effects. As a fiel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course operation, “Chinese Story” intervenes in the area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s a Chinese knowledge community, and promote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rea Studies. I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re are ten significant elements in Area Studies: academic accumulation, academic theory, academic orientation, scholar resources, student train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academic style, degree programs, academic associations, and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Area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ed to be built arou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language training, fieldwork, and research coverage.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strong capacity for Area Studies. Promoted by strategy, academics and capital, the US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talent train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mak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eagerness for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s to meet 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the needs of political contributors”. Japan’s Area Studies have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accumulation, and its research paradigm is unique, these experiences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China’s Area Studies on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Russia’s Area Studies emphasize disciplines’ autonomy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aradigm.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research are also close to the main fields.

**Key Words:** Area Studie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ter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omparison; Methodology